

总有一个女孩子的面影飘动在我的眼前:淡红的双眸,圆圆的大眼睛。这面影对我这样熟悉,却又这样生疏。每次当它浮起来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去理会,它只是这么摇摇曳曳地在我眼前浮动一会儿,蓦地又暗淡下去,终于消逝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的记忆也自然会随了这消逝去的影子追上去,一直追到六年前的波兰车上。

也是同现在一样的夏末秋初的天气,我在赤都游了一整天以后,脑海里装满了红红绿绿的花坛的影像,走上波德通车。我们七个中国同学占据了一个车厢,谈笑得颇为热闹。大概快到华沙了吧,车里渐渐暗了下来,这时忽然走进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我只觉得有一个秀挺的身影在我眼前一闪,还没等我细看的时候,她已经坐在我的对面。我的地理知识本来不高明。在国内的时候,对波兰我就不大清楚,对波兰的女孩子更模糊成一团。后来读到一位先生游波兰描写波兰女孩子的诗,当时的印象似乎很深,但不久就渐渐淡了下来,终于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然而现在自己竟到了波兰,而且对面就坐了一个美丽的波兰女孩子:淡红的双眸,圆圆的大眼睛。

倘若在国内的话,七个男人同一个孤身的女孩子坐在一起,我们即使再道学,恐怕也会说一两句带着暗示的话,让女孩子们红上一阵脸。我们只好来欣赏娇羞含怒然而却又带笑的态度。然而现在却轮到她们红脸了。女孩子坦然地坐在那里,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把我们七个异邦的青年男子轮流看了一遍,似乎想要说话的样子。但我们都仿佛变成在老师跟前背不出书来的小学生,低了头,没有一个人敢说些什么。终于还是女孩子先开了口。她大概知道我们不会说波兰话,只用德文问我们会说哪一国的话。我们七个中有一半没学过德文。我自己虽然学过,但也只是书本子里的东西。现在既然有人问到了,也只好勉强回答说自已会说德文。谈话也就开始了,而且还是愈来愈热闹。我们真觉得语言的功用有时候并不怎样大,静默或其他别的动作还能表达更多更复杂更深刻的思想。当时我们当然不能长篇大论地叙述什么,有的时候竟连意思都表达不出来,这时我们便相对一笑,在这一笑里,我们似乎互相了解了更多更深的东西。刚才她走进来的时候,先很小心地把一个坐垫放在座位上,然后坐下去。经过了也不知道多少时候,我蓦地发现这坐垫已经移到一位中国同学的身子下面去了;然而他们两个人都没注意到,当时热闹的情形也可以想见了。

在满洲里的时候,我们曾经买了几瓶啤酒似的东西。一路上,每到一个大车站,我们就下去用铁壶提开水来喝,这几瓶东西却始终珍惜着没有打开。现在却仿佛蓦地有一个默契流过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一位同学匆匆忙忙地找出来了一瓶打开,没有问别人,其余的人也都高兴高采烈地帮忙找杯子,没有

文 摘

《遥远的怀念》

□季羨林



一个人有半点反对的意思。不用说,我们第一杯是捧给这位美丽的姑娘的。她用手接了,先不喝,问我这是什么。我本来不很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反正不过是酒一类的东西,而且我脑子里关于这究竟是什么,反正不过是一个酒字,就顺口回答说:“是酒。”她于是喝了一口,立刻抬起眼含着笑仿佛谴责似的问着我:“你说是酒?”这双眼睛这样大,这样亮,又这样圆,再加上玫瑰花似的微笑,这一切深深地压住了我的心。我本来没有意思辩解,现在更没法可说,其实也不能说什么话了。她没有再说什么,拿出她自己带来的饼干分给我们吃。我们又吃又喝,忘记了现在是在火车上,是在异域;忘记了我们是初相识的异国的青年男女,根本忘记了我们自己,忘记了一切。她皮包里带着许多相片,她一张一张地拿给我们看。我们也把我们

身边带的书籍画片,甚至连我们的毕业证书都找出来给她看。小小的车厢里充满了融融的欣悦。一位同学忽然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立刻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我们的簿子上:Wala,一个多么美妙令人一听就神往的名字!

大概将近半夜了吧,我走到另外一个车厢里想去找一个地方睡一会儿。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一个位子。对面坐了一位大鼻子的中年人。才一出国,看到满车外国人,已经有点觉得生疏;再看了他这大鼻子,仿佛自己已经走进了一个童话的国土里来,有说不出的感觉。这大鼻子仿佛有魔力,把我的眼睛吸住,我非看不行,我敢发誓,我一生还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鼻子。他耳朵上又罩上了无线电收音机的耳机,衬上这生在脸正中的一块肥肉,这一切合起来凑成一幅奇异的图案画,看了我再也忍不住笑起来。但他偏又高兴同我说话,说着破碎的英语,一手指着自己的头,一手指着远处坐着的Wala,头摇了两摇,奇异的图案画上浮起一丝鄙夷的微笑。我抬起头来看看Wala,才发现她头上戴了一顶红红绿绿的小帽子。刚才我竟没有注意到,我的全部精神都让她的淡红的双眸同圆圆的大眼睛吸住了。现在忽然发现她头上的小帽子,只觉得更增加了她的妩媚。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这位中年人为何讨厌这一顶同她的秀美的面孔相得益彰的小帽子。

我现在已经忆不起来,我们是怎样分的手。大概是我们,至少是我,坐着蒙蒙眈眈地睡了会儿,其间Wala就下了车。我当时醒了后确曾觉得非常惋惜,我们竟连一声再会都没能说,这美丽的姑娘就像神龙似的去了。我仿佛看了一个夏夜的流星。但后来不能不到了德国,蓦地投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去,整天让工作压得自己喘一口气。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无论是做学生,是教书,尽有余裕的时间让自己的幻想出去飞一飞,上至青天,下至黄泉,到种种奇幻的世界里去翱翔,想到许多荒唐的事情,摹绘给自己种种金色的幻影,然后再回到这个世界里来。现在每天对着自己的全是死板板的现实,自己再没有余裕把幻想放出去,Wala的影子似乎已经从我的记忆里消逝了,我再也想不到她了。这样就过去了六个年头。

前两天,一个细雨萧萧的初秋的夜晚,一位中国同学到我家来闲谈。谈到附近一个菜园子里新近来了一个波兰女孩

子在工作。这女孩子很年轻,长得又非常美丽,父母都很有钱。在波兰刚中学毕业,正要准备进大学的时候,德国军队冲进波兰。在听过几天飞机大炮以后,于是就来了大恐怖,到处是残暴与血光。在风声鹤唳的情况里过了一年,正在庆幸着自己还能活下去的时候,又被希特勒手下的穿黑衣服的两足走兽强迫装进一辆汽车里运到德国来,终于被派到哥廷根来,在这个菜园子里做下女。她天天做着牛马的工作,受着牛马的待遇,一生还没有做过这样的苦工。出门的时候,衣襟上还要挂上一个绣着“P”字的黄布,表示她是波兰人,让德国人随时都能注意她的行动;而且也只能白天出门,晚上出去捉起来立刻入监狱。电影院戏院一类娱乐的地方是不许她去的。衣服票鞋票当然领不到,衣服鞋破了也只好将就着穿,所以她这样一个年轻又美丽的女孩子,衣服是破烂不堪的,脚下穿的是木头鞋。工资少到令人吃惊。回家的希望简直更渺茫,只有天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她的故乡,她的父母!我的朋友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我的眼前电火似的一闪,立刻浮起Wala的面影,难道这个女孩子就是Wala吗?但立刻我又自己否认,这不是她的,天下不会有这样凑巧的事情。然而又想到,这女孩子说不定就是Wala,而且非是她不行;命运是非常古怪的,它有时候会安排出人意料的事情。就这样,我的脑海里纷乱成一团,躺下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伏在枕上听窗外雨声滴着落叶,一直到不知什么时候。

第二天早晨起来,到研究所去的时候,我就绕路到那菜园子去。这里我以前本来是常走的,一切我都很熟悉。但今天我看到这绿绿的菜畦,黄了叶子的苹果树,中间一座两层的小楼,我的眼前发亮,一切都蓦地对我生疏起来。我仿佛第一次看到这许多东西,我简直失了神似的,觉得以前菜畦没有这样绿,苹果树的叶子也没有黄过,中间并没有这样一座小楼。但现在却清清楚楚地看到眼前有这样一座楼,小小的红窗子就对着黄了叶子的苹果树,小巧得古怪又可爱。我注视着窗口,每一刹那我都盼望着,蓦地会有一个女孩子的头探出来,而且这就是Wala,在黄了叶子的苹果树下面,我也每一刹那都在盼望着,蓦地会有一个秀挺的少女的身影出现,而且这也就是Wala。但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带了一颗失望的心走到研究所,工作当然做不下去。黄昏回家的时候,我又绕路从这菜园子旁边走过,我直觉得觉得反正在我住的这地方不远的小楼里有一个Wala在;但我却没有一点愿望再看这小楼,再注视这窗口,只匆匆走过去,仿佛是一个被检阅的兵士。

(摘自《季羨林人生六书:遥远的怀念》,季羨林著,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2020年11月底,我的朋友、青年作家程文敏寄赠我他编著的《抗疫者说》一书,并邀请我为此书写些评论文字。我和他书中的其他作者一样,也经历了庚子之年无前例的湖北疫情,感同身受,甚至也见证了亲友的生死之际,终生难忘。因而,我是作为读者、参与者、见证者的多重身份,来阅读程文敏和35位“抗疫者”(或“口述人”)如何讲述抗疫史,如何讲述他们亲历的刻骨铭心的人与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程文敏在代序中所言:“我们希冀这些篇章,尽可能全方位地再现湖北各地的抗‘疫’现实,尽量贴近文学品质、纪实意义与文献价值三位一体且俱佳的目标”,成为一部民众抗“疫”信史。当代著名口述史理论家、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阿利桑乔·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说:“口述历史是书写而成的,但永远不要忘记它是从口头开始的;它是独自式的,但永远不要忘记它是从对话开始的;它是重视想象力,但永远不要忘记真实事件。然而,传统的学术写作和大量的文学写作将这些叙述的口头、对话、想象的品质都视为障碍和杂质。为了让故事更加真实,我们需要忘记历史学家在故事制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当读完《抗疫者说》之后,我意识到,程文敏和他召集的35位特殊的写作同仁,他们试图完成写作此书的初衷和野心:构建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疫情口述史。

在史无前例的严峻疫情下,人究竟该如何克服恐惧,如何接受自己,如何面对现实与死亡,如何在利弊中权衡,如何在善恶中抉择,如何在相互扶助中实现救赎?35位身处一线的抗“疫”者用生死行动和血肉见证了这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程文敏和他的著作同仁,既是不折不扣的行动主义者,同时又是背负“口述使命”的灾难叙事者,这种双重身份,于今天的文学伦理叙事而言,是一种荣光,甚至具有幸存者的救赎意义。这35位口述人中,有公务员、机关干部、志愿者、村干部、援疆民警、主任医师、护士,也有派出所所长、教育工作者、海外华侨、医疗专家、博士、佛教工作者,还有交通工作者、媒体人、文艺工作者、记者、慈善工作者等等,单从这个多向度的社会个体来看,他们身临疫情一线的观察视角与心理感受截然不同,包括他们对待生死、疾病、善恶、权力等的体验与看法也会有偏差;而这种差异性,正是他们作为灾难叙事的口述者的真实之处、可贵之处,因而也让他们们的口述更加接近疫情叙事的真相,并且呈现人性的温暖与善恶,呈现生命与自由的对抗关系。因而,我们深刻意识到,他们口述的故事并非虚构,并非“他者”的故事,而是“我

们”的故事,并且成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当面对口述者的伦理叙事价值与入道主义情感时,读者或许更多关注口述者所流露出的淳朴的集体主义温情与抱团取暖、抱团自救的人类天性。

程文敏编著《抗疫者说》这部具有口述史意味的书,不禁让我思考一个严肃的哲学伦理命题:“口述史目的是什么”。1948年,阿兰·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口述史的方法记录美国政商界和社会名流的记忆。从此,口述研究不断盛行,尤其是21世纪,全球更多学者参与口述史的研究。青年长江学者胡浩在《口述史与田野访谈:梳理与比较》一文中仿佛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历史学界之外,口述史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也逐渐被社会科学界所采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口述作为一种个人叙述,内容上不仅包括具体的事件和行为,同时也包含了叙述者本人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诠释,口述史的内容兼具事件和意义的双重特征。从这一层义来说,口述史就绝不仅仅只是历史。更进一步说,口述所展现的也许并非真正发生的事情,确切地说,口述呈现出来的是个人对过去的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也许经过修饰,掺和了个人的认同感、价值观;这种记忆也许因为历时久远经受了遗忘、拼接和再记忆,是一种记忆再现,或许真实,或许带有虚饰的成分。在社会学界有关记忆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延续哈布瓦赫开创的集体记忆范式,认为‘一切记忆都是集体塑造和社会建构的产物’。从这个层面来说,口述史与社会学之间似乎更具亲和性。”口述史学者陈墨则认为:“口述历史工作的真谛,表面形式是访谈问答,深一层则是心灵告白。我们的目标是要引导对方勇敢、坦然、诚实、细致且自然地说出个人生平、社会经历、专业历练及心路历程”,甚至有人说得更加干脆,口述史研究就是心灵考古,“约哈里之窗”(Johari Window)。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我一直都在寻找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应当最大程度地传达我耳朵所听到和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我做了很多尝试,最终,我选择让人们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她找到的这种表达方式,正是口述史写作。正如乔治所言:“口述史可以让我们摆脱历史记载中的上帝视角,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体会和感受小人物在大事件中的悲欢离合。”

同样,程文敏也十分敏捷地借助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灾难叙事沸点,召集了他的一批写作界朋友在极短的时间内,围绕这一灾难叙事命题,进行“口述性”非虚构写作,足见程文敏的文学敏感性与作为一名作家对国家灾难叙事的社会伦理担当,这种写作精神是值得称赞的,抑或可以把程文敏积极面对灾难叙事的写作姿态,称之为另一种心灵救赎与“叙事治疗”(麦克·怀特语)。当我们从普世价值出发,反观《抗疫者说》的文学现实意义则是有效的。当我将要完成本文写作的时刻,新冠疫情依然在全球肆虐,国内部分省市依然处于紧张的抗疫斗争之中,35位口述者的经历与见闻再度上演。由此可以想见《抗疫者说》一书的现实意义,无疑对正在发生严重疫情的城市是一个极大的警醒与反思。“抗疫”已经变为人类面临生命危机而选择自我保护的常态。35位“口述者”无疑在文学与历史的边界塑造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他们极为生动地深刻道出“抗疫者”的灵魂历练与生命体验:“当我们站在一边来回忆与眺望,它们具有非虚构文学中的口述史气质;当我们站在另一边来反观与思考,它们却已成为疼痛的历史。”

历史激流中奋进的民族史诗

——评长篇历史小说《阿莫沙蒂》

□杨荣昌

《阿莫沙蒂》是云南青年作家秦迹殊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以元末明初政治动荡为背景,叙述曾在西南边疆“雄冠三十七蛮部之首”的罗婺部在多重军事势力角逐中,最终归顺明朝实现统一的历史。主人公阿莫沙蒂的原型是罗婺部著名女土司商胜,她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自运粮米千石到昆明金马山,搭青棚数里杀畜献歌犒劳明军,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

小说在此风云激荡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叙事。其时,元朝已经衰落,朱元璋定都南京多年,实现了大半个中国的统一,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仍处于元梁王的统治之下,兼有大理国段氏的影响,作为势力强盛的罗婺部,在时代变动中何去何从,吸引了各方的密切关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主人公阿莫沙蒂由此登场,她幼年丧父,无意于政治却阴差阳错登上土司的宝座,成为权倾一方的统治者。面对外部势力的虎视眈眈,加上部落内明或暗的政权之争,她变得聪颖而早熟。在部落面临的艰难抉择中,她看到了历史不可逆转的大势,最终平复叛乱顺应潮流走向统一,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性选择。

写出鲜活的人物性格是小说成功的标志。阿莫沙蒂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到了风霜渐染的中年,性格发生了极大的蜕变,其缘由可从小说中找到内外因素的佐证,符合于自身成长的规律。此外,她的母亲斯补组舍也是个个性鲜明的人物,青年时从曲靖土司家嫁到罗婺部,带着政治联姻的使命,由于丈夫早逝,过早地体味到命运的诡谲,性格变得怪异乖张、阴鸷多疑,在与女儿的争斗中走向母女反目。小说重点突出了血统作为部落结构的核心,为了部落文明的生存和延续,斯补组舍欲响应拥立大理段氏主管,精心准备着做最后的抵抗。深谙知己知彼战术的她,不惜花重金让土司继承人阿莫蒲智远离云南,回汉学深邃之地学习汉儒文化,了解汉人文化习俗和致命弱点,将来效力于不可避免的反抗之战。没承想,刚成年的阿莫蒲智赴汉中学习汉儒文化后,竟被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深深吸引不能自拔,尚未成型的观念意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又眼见元统治者理政的腐朽,学业荒废之后回到故乡,决心进行部落血统结构的改革,与婁子(奴隶)结婚生子,触怒了罗婺部落贵族阶层,终被斯补组舍清除出家族和谱牒,成为无根之人流亡欧洲等地。阿莫蒲智对阿莫沙蒂产生着深远影响,对其生死抉择至关重要。他流亡异地时与阿莫沙蒂共用同一个汉名“商鱼胜”,两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微妙而坚韧。后来他又以汉人胭脂商的身份重返故里,协助阿莫沙蒂完成部落家族融入中华文化大家庭。小说中阿莫蒲智的笔墨分量较重,可见他是汉文化对部落统治者发生

或臣服蒙元、或投靠段氏的不同反应,他们中既有土司贵族,又有部落权臣,还有众多的平民和奴隶,显现了历史大势来临时的众生相。战争与和平历来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人渴望战争,但是求和平又往往将遭受诸多的质疑和非议,所以站在历史高远的视野上审视民族的前世今生及未来,并适时作出痛苦却又最终被证明正确的抉择,对于一名政治家来说是何等严峻残酷的考验。罗婺部最终纳入中原版图,避免了部落再次遭受战火摧残,这是在数次磨难中得出的宝贵启迪,是众多族人付出生命代价换来的民族进步,体现了阿莫沙蒂作为一名卓越政治家的深明大义。小说书写了历史进步的主潮,阿莫沙蒂在重重围困中突破困局,甚至不惜辜负先父遗愿,夫妻反目,母女决裂,包括可能会背负的历史骂名,也要归入政治大一统的格局之中,正是源于她对历史铁律的坚定判断。如她一般的女中豪杰,只有贵州水西土司奢香夫人可以相媲美。

彝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有着繁多的民族文字、雄浑的创世史诗和瑰丽的民间传说。小说在书写历史进步主潮的同时,呈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它们是通过一系列具有较高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如民居、服饰、礼仪、饮食用度等来表现的。同时,民族的哲学观、伦理观、自然观,又通过祭祀、“清气”“浊气”之辩等来彰显。活性的物态文化和隐性的伦理文化,构成彝族人生不息的文明,在此文化濡染下成长的族群,有着鲜明的文化心理。彝族人说善于譬喻,用自然万物指称抽象事物,带有鲜明的民族智慧。秦迹殊以小说的方式写活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对历史轨迹的串联叙事中,以梦境、神话、传说、臆想来呈现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体现了充沛的想象力。文化的修养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阿莫沙蒂》对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运用,折射出作家深入钻研历史典籍的功底,语言沉郁古拙,充满质感,文雅与世俗相交织,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也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面相。

在历史的巨大容器中,秦迹殊有了自由的创作场域,虚构的才能得到尽可能地释放,她在遵从历史规律的前提下,根据自己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理解,编织故事,创设情境,部署结局,再造一段个人的历史。身为女性作家,对于女性情感与命运的娴熟把握,表现得细致入微又跌宕起伏。小说书写战争波澜壮阔,描写心理细腻温婉,叙述阴谋险象环生,抒写爱情荡气回肠,众多的人物各有其特征,明暗线铺排交错,情节的推进合乎逻辑,没有突兀之感。宫闱秘事与铁腕风云,自然人性与民族文化,在交相杂错的叙事中,使得阴谋与爱情轮番上演,西南民族政权的角逐变得惊心动魄,叙事少了温情脉脉的舒展与抒情,体现出一种残酷冷峻的诗意。

